



# 心灵在文字里 穿行与歌哭

——参加“2013 青创会”的打工作家作品选萃

## 寒冷

(外二首)

□郑小琼

在某台废弃的机台间锈迹斑斑的时光  
无法窥探的往昔窗口夕阳疲倦的曲线  
孤零零的影子灰烬像大海边遗弃的铁锚  
燃烧的炉火熄灭在湿漉漉的雾间

庞大无法认知的现实在雾中顺着大海  
命运安静地安静地起伏着  
我没有读懂它的寒冷来自何方  
狭窄的甬道更为迷茫的黑暗……

铁锈间任意出现的面孔没有名字  
在废弃的机台挖掘着弯曲的命运  
时间将在他们的身体滋生贫穷褐色的锈

像衰老而疲倦的机台遗弃某个角落

腐烂的内部  
在黑焦油的锈机台写着  
黑暗中的山峰跟它们的颤抖  
星星像多刺的生活微暗而贫穷  
火花机微弱的光中铁质的词

被工业折磨的句子  
它们能够给予我  
像切割机一样锋利的节奏  
切开生活我看见腐烂的内部……

## 机器

像野兽一样嚎叫的机器  
她刺骨的绝望贫穷与肮脏  
像陡峭的海床在机器的爆裂声  
高楼在闪烁它们昂首阔步……  
荔枝林海滨公园灰白的五金厂  
镜中铁鸟的嚎叫张开铁质的羽翼  
在它黄色或者红色的眼神中留下扭曲的  
钢铁塑胶结晶了时代的幻象与黑暗  
油腻的长爪抓住铜质晶片黄色光亮的  
生活背面那些饱含汗液的指头间  
机器嘶叫声锋利切割着他们从机台上  
浮出一张张疲惫的面孔年幼而迷茫的脸  
瘀痈着内心的沉默转动的碾磨机  
在耸立的繁华的城市屋脊一个工人  
他眺望绿色的记忆被碾碎他绿色的梦  
也被嚎叫的机器吞噬……

## 鸣叫

比梦与大海的栅栏更长的鸣叫  
喧哗的机台一座座孤独的岛屿  
铁片与机器磨合着像命运的齿轮  
转动闪烁蠕动……在劳作的深处  
在工厂的机台我抵达的港口——  
错动的头颅和肩胛骨我们疲倦如同  
雪花般的脸……在白炽灯下  
垂下辽阔的绝望与迷茫  
我们透过机器看软体动物样的大海  
柔软地起伏着——在深蓝色的海洋下  
贴着汹涌的鸣叫更为悠长的命运  
鸣笛——弯曲的铁片弯向内心蔚蓝的大海  
在不同的人群间我与自己的命运重逢  
那些遥远的岛屿在大海上漂浮着靠近  
在异乡的机器的长鸣中我们与大海交换  
体温……命运的机台奔波喘息

创作感言：

早期写作的“打工诗歌”可以认为是我个人的精神传记和生存的证明,后期写作“打工文学”评论,则使我看到那么多类似的心灵在文学里穿行和歌哭,连接着大地、肉身与灵魂的轨迹。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存在,是嵌于现实之中的“他者”,它在本质上对现实秩序及其经验表象保持了天生的警惕和敏感,提供了对于历史存在的深刻理解,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有力批判。

## 一个日子的延伸

□柳冬妩

今年我不得不提前几天为父亲办了寿宴。9月23日是我父亲的生日,也是青创会的报到时间。我的生命与这个日子注定了有着血脉相承的宿命联结。我至今珍藏着一张20年前的火车票,它所标示的时间也正是这个日子,它蕴蓄着我个人最深切的历史感和命运感。我20年来的生活与写作,不过是这个日子的一种暗示、延伸、召唤和演绎。

1993年9月的一个雨夜,带着无奈和迷惘,20岁的我在上海登上了开往合肥的火车。在最炎热的几个月里,我修过路,推过翻斗车,抬过大石,脚过沪,几乎把大上海最繁重的体力活都领教了一遍。不小心闪了腰后,我连一把铁锹也无法提起,除了回家,似乎别无选择。在合肥下车后,命运把我抛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想回家,但又不甘心这样返回穷乡僻壤,想到广东打工,为人生再作一次挣扎和闯荡,但心里却感到一片茫然。在合肥火车站整整徘徊了一天一夜,我仍举棋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正如我在诗歌《盲流》中所写到的那样:“被命运所推/我们的走动/改变了路的形状……/我们的脸都很憔悴/掂起的脚跟起伏起伏……/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瞎子/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所有的去向都是试探/移动的脚步不得不小心翼翼/生命的岔路上总生出某种开始某种结局”。

天黑时,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碗面,然后买票坐上了到蚌埠的列车。蚌埠,合肥与老家霍邱呈三角形分布,如能买到火车票,就去广东,否则第二天早上便从蚌埠回家。这是我反复权衡一天之后作出的决定。

最终的结果是,一到蚌埠,我便买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五分钟后,我怀着一种渺茫的希冀与深深的惶恐踏上了列车。人生如棋,这五分钟对我来说极具人生意义。五分钟前与五分钟后有可能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生活的不可预料也许就属于这五分钟。

87次列车把昏昏沉沉的我又带回了上海。到了上海才发现,我买的火车票是要转车的,要么从上海,要么从杭州转往广州。想起大上海辛酸的经历,一赌气便坐到了杭州。

在杭州火车站签证,我的火车票被贴了块黄色纸条,上写:9月23日209次  
早上9点20分开  
车无座

我急切地看,虽是二元钱一只的电子表,但它还是准确地告诉我:现在是9点30分。“这时间,搞错了吧?”我对签证员说。



李明亮,安徽宣州人,现居浙江台州。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省作协首个外来务工人员签约作家。曾获《星星》诗刊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大赛奖一等奖、台州市第三届青年文学之星奖等,诗集《裸睡的民工》入选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2012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郑小琼,女,1980年生,多篇诗歌散文发表于《诗刊》、《山花》、《诗选刊》、《星星》、《天涯》、《散文选刊》等报刊,作品多次入选年度最佳等选本,曾参加第三届全国散文诗笔会、诗刊第二十一届青春诗会。获得“利群·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与韩寒、邢荣勤、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



柳冬妩, 本名刘定富,男,1973年生于安徽霍邱县。现任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兼任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东莞市青年诗歌学会会长、《南飞燕》常务副主编,系广东省第二重点扶持项目签约作家和广东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广东省文艺评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广州,广州,没错,你看看票,23日,明天!”签证员生气地举起喇叭。

我努力地恢复一下记忆,想一想,对,今天是22日。我四周环顾,发现候车室座无虚席,没办法,只好找了个稍微干净的地方,把包放下来当座位,这样又在杭州呆了23个小时50分钟。

经过几天几夜的辗转漂泊,我于1993年9月25日第二次抵达了广东东莞大朗镇。一下车,迎接我的便是倾盆大雨。雨像心中的茫然、纷乱、朦胧、无绪。举目无亲,饥饿与疲惫一齐袭来,我漫无目的、头昏眼花地徘徊在大朗街头……

时空的迁移形成了生命自身的秘密。很难想象,如果不是20年前那次艰难的漂泊,如果不是终于移植到广东这片广袤而丰厚的土地,我的人生轨道肯定与现在截然不同。几十年来,与我一样外出打工、寻找梦想和改变命运的人数以亿计。当波澜壮阔的打工潮强行进入我们的视野,世界就像柏拉图所描述过的那一串铁指环,受磁力的感应,它改变着滚动的方向。我们的生命与之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呼应。成千上万的农民,披一身尘土,背一副行囊,浩浩荡荡地走出他们世代相依的土地,涌向广东、开进浦东、走入苏浙、奔向北京……

“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移植青春/定位命运”,“胀裂的背包泄露出/无数有声有色的遭遇”。美国《时代》周刊曾用“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来评述发生在乡土中国的这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人类的流动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自身和社会,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作用。“走出一步天地宽”,这是一种社会的文明。在声势浩荡的打工大潮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文明的壮观。打工族趋向现代文明的背影成了划分一个时代的界碑。在这个群体中产生一批“打工作家”,出现“打工文学”现象,是历史的必然。

王安忆在青创会书面发言中提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铁凝主席,她是知青作家中间最年轻的一个”,“而知青作家则是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两千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和两亿农民进城打工经商,都是史无前例的人的放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打工作家与当年涌现的知青作家一样,他们的作者身份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随着不断变化着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制度设置而出现并相应变化着的一种历史建构,其本身就是中国经验的一个复杂表述。比起当年的知青文学,打工文学对城乡中国的书写,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我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也仅仅提供了未完成的描述,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延伸。

## 致读者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在城市中间,工作在此,“安家”在此,但他们却不是这里的人;有这样一群作者,他们用文字描写城市,记录着工厂、工地、工人的命运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但他们却不单纯地依靠文字“吃饭”;有这样一群作家,他们的笔尖触到打工者内心的最深层,鲜活、充实的文字是无法替代的,因为他们曾经或现在就是一个打工者。

自从我接触这个文学领域以来,拜读过数万篇打工者的文字,这些篇什,有初学者的羞涩、成熟者的大气,然最令我为之感触的还是他们文字里透着的深刻、真实。他们用自己的执著,把内心深处的“褶皱”充分展现在大家面前,并且获得了读者和文坛的认可。今年九月,他们中的优秀者如王十月、郑小琼、李凤群等还参加了2013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本期,特编发其中部分作者的作品,让他们的文字引领着我们一起去感受生活、感受生命。(周倩)

创作感言：

一个写作者,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有意无意已与这个世界达成妥协——他瞻前顾后,甚至可能把真实的自我隐藏得滴水不漏,我想,纵使他有再高妙的文字功夫,亦难得佳作。

我以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敢于把自己最隐秘的内心袒露出来,要用力把这个世界最深、最暗、裹得最紧的褶皱抖搂出来,放在阳光下,让晴朗的风为它擦拭。



## 缝隙里的写作

□李明亮

1999年8月,我背起一个发白的牛仔包,告别四年的“孩子王”生涯,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深圳这座灼热的城市。

经老乡介绍,我很快在石岩镇一大型合资企业做技术员(也就是机修),每天架模、换模、修机,白天8个钟不算,晚上从6点至少加班到11点,下班打卡已是第二天已成寻常事。上班犹如上战场,半天时间都难得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就是有机会去,也是一路小跑。人整天又累又困总是想睡觉,经常是下班回宿舍,见着床就一倒,马上就睡着了。一双似乎已被油污浸入皮肤、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手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一次新伤,特别是手背,常常是昨天的一处破皮还未结痂,今天又有一个地方流出鲜血……幸好姐姐和我同在一厂,每天满是油污的衣服都是她不声不响地拿去洗净叠好放在我的床头。一个难得的星期天晚上,我趴在床上,一口气写下100多行的打油诗《加班、加班、再加班!》。

从石岩离职后,我来到宝安“另谋高就”,和一老乡合租了一间只可放一张两层铁架床的单房,白天外出找工作,下午四五点钟吃个两元钱的快餐后回来,便哪儿也不去了,光着膀子趴在床上一门心思“舞文弄墨”。对门过道的一个床位上住着一对野鸳鸯,两人都20来岁,男的两只手臂都纹了刺目的龙,女的凹凸玲珑,面目亦佳,白天在那里躺着和男人比长短,晚上十来点钟便不见了踪影,只到天亮才敲门回来。白天二人睡累了,便面对面坐在床上抽烟,那女的抽一会儿便咳嗽起来,越咳越剧烈,但她天天照样抽,照样咳,也从未听那男的说什么。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秃笔,写了一首《抽烟的少女》,和其他几首诗一起寄给了《飞霞》杂志,参加“千禧新诗大展赛”,后来这首小诗获得大赛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因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一个月后我踏上了回乡的列车,在没有老乡和朋友相随的路上,我的内心愉悦而充实,因为在我的背包里有厚厚的一叠手写稿和我在厂。

2000年3月,我又南下应聘进宝安西乡一港资电子厂做仓管员,当时心里一阵窃喜:一直听说做仓管较轻松,我不是贪图安逸之人,我只想少加点班,有点时间的缝隙属于自己。谁知进厂不久,恰遇搬仓,又要迎接ISO检查,每天晚上至少加班到23:30以后……几次大劫终于挨过,从7月初,一般晚上只加班到9:30,每天晚上加班一结束,我总是力争前三名打了卡,便跨上自行车一阵猛踩回到宿舍,抓起底裤和桶就直奔冲凉房,若是稍有耽搁,下班的大部队一起杀回来,想冲凉不知要排队到猴年马月。差不多每天都是我第一个冲凉,不是急着去拍拖,也不是急着扑克麻将,出街闲逛,而是想让自己多一点时间做一个“爬格子”的动物。

人住宿舍时,许多人都抢着睡下床,从石岩离职后,我来到宝安“另谋高就”,和一老乡合租了一间只可放一张两层铁架床的单房,白天外出找工作,下午四五点钟吃个两元钱的快餐后回来,便哪儿也不去了,光着膀子趴在床上一门心思“舞文弄墨”。对门过道的一个床位上住着一对野鸳鸯,两人都20来岁,男的两只手臂都纹了刺目的龙,女的凹凸玲珑,面目亦佳,白天在那里躺着和男人比长短,晚上十来点钟便不见了踪影,只到天亮才敲门回来。白天二人睡累了,便面对面坐在床上抽烟,那女的抽一会儿便咳嗽起来,越咳越剧烈,但她天天照样抽,照样咳,也从未听那男的说什么。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秃笔,写了一首《抽烟的少女》,和其他几首诗一起寄给了《飞霞》杂志,参加“千禧新诗大展赛”,后来这首小诗获得大赛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因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一个月后我踏上了回乡的列车,在没有老乡和朋友相随的路上,我的内心愉悦而充实,因为在我的背包里有厚厚的一叠手写稿和我在厂。

2000年3月,我又南下应聘进宝安西乡一港资电子厂做仓管员,当时心里一阵窃喜:一直听说做仓管较轻松,我不是贪图安逸之人,我只想少加点班,有点时间的缝隙属于自己。谁知进厂不久,恰遇搬仓,又要迎接ISO检查,每天晚上至少加班到23:30以后……几次大劫终于挨过,从7月初,一般晚上只加班到9:30,每天晚上加班一结束,我总是力争前三名打了卡,便跨上自行车一阵猛踩回到宿舍,抓起底裤和桶就直奔冲凉房,若是稍有耽搁,下班的大部队一起杀回来,想冲凉不知要排队到猴年马月。差不多每天都是我第一个冲凉,不是急着去拍拖,也不是急着扑克麻将,出街闲逛,而是想让自己多一点时间做一个“爬格子”的动物。

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活让我渐渐厌倦。2011年5月,我从这家即将上市的企业离职,与几位作家朋友携手,于7月份成立了台州首家文化原创公司——台州人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尝试为文化事业和当前社会的文化需求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版漫画 赵春青

## 流泪的故事只是瞬间的逗点

□欧阳

据专家的说法,现代意义的小说大约还不到200岁,细论起来,“打工文学”是最年轻的了,就像是个新生的婴儿。最年轻的也最有雄心。“翻开前辈作家的经历,29岁的雨果完成了《巴黎圣母院》,34岁的艾略特完成了《荒原》,30岁的巴尔扎克完成《朱安党人》,对于年过30的我翻到这些前辈作家的创作年表时,常常有一种近乎羞惭之感。”这是“打工文学”作家郑小琼的感慨。

作为理想,是个作家大概都想写出拥据恒久生命力的东西。不过这样远大的梦想不太容易得逞,退而求其次,能够影响一代人也是伟大的成就。那么什么样的作品(小说)才会给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带来深远的影响呢?换个角度,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呢?即便是这样的问题,可能的答案也会是多种多样的。《文心雕龙》就讲过,神思、风骨、丽词,等等,只要占一项就是好作品。”专业教授如此教导也算是本分。不过非知识分子要完全吃透学问家的意思恐怕得借助皇历。与批评家不同,普通民众不会从结构、思想之类的作者、批评家角度去解构商品,有趣、生动以及感人等口头宣传是他们对作品好坏的评价,特别是令人感动的故事,对眼泪太多的素雅之人而言,无疑是最好的。其实不管是煽情的杜撰还是真实的场景再现,触动人们情感共鸣的东西总是可以得到专家和普通读者的认同,“特别特别好感人。”我时常听到流泪人士这样断言。一些冷静的专家在辨识作品好坏的时候也会以是否更生动感人来做高下的取舍。有思想家认为人的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非逻辑性的,即是非理性的,如果此观点有道理,那么“感动”作为标准就是成立的。

一般而言,凡人纪实容易感动人,不仅是那些细碎、凡俗的梦想被撕毁,还有“像野兽一样嚎叫的机器(郑小琼《机器》)”声中孕育有梦想的工地……通过“用力把这个世界最深、最暗、裹得最紧的褶皱抖搂出来(李明亮)”,“连接着大地、肉身与灵魂的轨迹(刘定富)”。作为一种社会变迁催生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在主流文坛的视野下,基本上就被归类于“底层叙事”的凡人纪实,以我的视角来看,这种“底层叙事”就是溢满现实生活影像的感人故事,作者的切身经历赋予了她生动、感人的画面(即使没有现实感人)。

每每接触到“底层叙事”我总会想起那些曾经抽取了很多人流泪的生活叙事,比如“伤痕文学”,比如《活着》(余华),等等。那些像生活一样的现实存在和今天“打工文学”中的很多投影一样,让人款款不已。然而,似乎很少有人去撕开伤痕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多少人思考为什么要活着。

如果“活着”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今天的家珍还会对春生喊“你要好好活着(《活着》)。”当个体在艰辛的努力之后,洗去手上的油污,机器的噪声就不会像野兽一样嚎叫了(现实存在也不是那样),问题就是群体呢?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活轨迹中,流泪的故事只是瞬间的逗点,我们不能指望另外的人来改变命运,在展示出来的悲剧故事中,如果只是眼睛看见的影像,那么很可能什么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多几许泪水而已。如果我们可以超越灯光下的亲眼目睹,展示出地下室里的思考,那么,改变的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了。

柳冬妩的《盲流》写到:“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瞎子”,也许就是因为眼睛睁得太大,我们才成了睁眼瞎,谁知道吧,我不是专业人士,本该缄口不言。决定权不妨还是交还给时间吧。